

山西大学

云冈学研究院通讯

第2期
2021年1月

主　　编：杭　侃
编　　辑：武　夏　卜佳慧　冯鹏锦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13 日
地　　址：太原市坞城路 92 号
封面图案：云冈石窟第 10 窟前室西壁第 4 层龛右梢间思惟菩萨

目录

MAIN CONTENTS

◎研究院动态

“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 90 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山西大学召开 • 03

我校第四届新年论坛举办：聚焦云冈学建设与石窟寺调查研究 • 06

山西大学关于自主增设“云冈学”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决定 • 08

山西大学图书馆成功申请《面向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研究：以云冈学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为例》课题 • 08

云冈学文献中心购入《中国基本古籍库》 • 10

◎学术活动

2020 年度文博界十大新闻事件 • 11

全国首届前沿交叉学科论坛暨前沿交叉研究院联席会举行 • 12

厅校合作培养高质量文博人才：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成立 • 15

“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与修复学术论坛”举行 • 16

北京大学文研院“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正式开启 • 17

“大美之颂 • 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盛大开幕 • 19

“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开展 23

目录 MAIN CONTENTS

◎云冈学研究

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 • 25

逢山开路！调查山西石窟寺！ • 31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冈石窟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 33

郝春文：敦煌学流光百年，历久弥新 • 34

10 年坚守，浙大张涌泉教授团队让敦煌文献“孤儿回家”“亲人团聚” • 38

文物保护看基层：“保护好大足石刻就是为人们留住‘乡愁’” • 41

◎同仁学术

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李零 • 43

探索的途程——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杨泓 • 47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学概论□温玉成 • 51

“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王邦维 • 54

◎书刊推荐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 37

《参差集》 • 50

《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 56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二） • 57

“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山西大学召开

2020年值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12月12日上午，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承办的“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山西大学召开。

座谈会开幕式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院长主持，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教授致辞，杭侃教授深情回忆了徐苹芳先生的学术与工作历程，说明了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并对各位参会学者与嘉宾表示了欢迎和感谢。

随后，播放了由主办方制作的徐苹芳先生纪念视频，其中包括不少徐苹芳先生生前工作的珍贵影像。

徐苹芳先生生前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著作，其中徐苹芳先生的两部文集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版社陆续出版。

自2012年至2019年，《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和《徐苹芳文集》（共五卷），即《明清北京城图》、《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丝绸之路考古论集》、《考古剩语》，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苹芳北京文献整理系列》共四种，即《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残本）》、《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辽金行记九种·辑本揽辔录》、《辑本析津志》，于2017年由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

座谈会上，两个出版社的代表吴长青先生和刘凯先生先后介绍了出版情况。

其后，来自全国考古界各高校、研究所、博物馆的同仁们，共同追忆徐苹芳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工作事迹。

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首先回顾了徐苹芳先生与宋元考古学科体系的建立。他指出，徐苹芳先生是宋元明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构建者之一，这一过程中，徐先生的工作得到了夏鼐、宿白等先生的直接指导。1980年代中期，徐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写就了“宋元明考古”长词条，并于198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宋元明考古》课程，系统归纳了宋元明考古简史、宋元明考古的分期和宋元明时期的城市、陵墓、手工业遗迹与边疆地区考古和中外交流考古等内容，初步建立了宋元明考古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这一体系

主线明确，并不断丰满。

杭侃教授补充了徐苹芳先生对丝绸之路、宗教遗迹等方面研究，对于宋元考古学科体系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不少先生如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吉林大学彭善国教授都回忆了徐苹芳先生主持新编《中国陶瓷史》的有关事迹，谈及徐苹芳先生将陶瓷考古从器物研究上升到手工业考古，并进一步上升到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层面的宏阔视野。

不仅限于宋元明考古，徐苹芳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很多方面都有系统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谈到，徐苹芳先生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不仅是宋元考古等学科体系的创始人，也曾是中国考古学事业的领导者。徐苹芳先生担任考古所领导期间，就曾组织了“文明起源课题组”，通过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有效地推动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

董新林研究员、杭侃教授、李梅田教授等，还都就徐苹芳先生生前用力甚深的城市考古学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补充。吉林大学滕铭予教授也回忆了徐苹芳先生对秦汉考古的研究，以及指导她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具体过程。

徐苹芳先生不仅博学多识，而且谦和儒雅，生前曾为全国各地很多地方考古工作予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杭州博物院杜正贤研究馆员回忆了徐苹芳先生对杭州临安城考古的高度关注和指导，那时因杭州旧城改造的机会，临安城迎来众多重要考古发现，徐苹芳先生每年都要去杭州一至两次，有时停留的时间还很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志勇副所长也回忆了徐苹芳先生对元上都考古与申遗的帮助和指导。

徐苹芳先生还是一位传道者，用自己坦荡无私的胸襟和以诚相待的人格，培养和教导着一代代莘莘学子。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任博士生导师以外，徐苹芳先生还在北京大学兼任客座导师，并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课。此外，也还在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

李梅田教授、王光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辛革研究馆员、浙江大学李志荣副教授等都谈到了徐苹芳先生在北大授课时，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和翩翩君子的风度。滕铭予教授、彭善国教授和南开大学袁胜文教授则分别追忆了徐苹芳先生在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招收博士生的过程，和对这两所高校学科建设的帮助。

徐苹芳先生光明磊落，耿直刚介。他去世之后不少媒体刊文悼念，有媒体称他为“考古界的良心”。座谈会上，李梅田教授、秦大树教授、李志荣副教授等不少学者都谈到徐苹芳先生为保护北京城、保护文化遗产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徐苹芳先生身上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将为后人所铭记。

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是沿着先生当初的道路，继承先生的事业。座谈会上，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介绍了自 2015 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组织开展的学术活动和未来的工



座谈会现场



与会代表合影

作计划。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信副院长和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王占强秘书长介绍了巨鹿宋城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新收获。会议代表们还参观了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和发掘中的晋阳古城。

座谈会上，好几位同仁都提到徐苹芳先生书房上悬挂的一副先生手书，内容是：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这后来在徐苹芳先生的追悼会上，被用作纪念的挽联:“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贵贱荣辱，淡泊宁静；横批：来去皆无”。徐先生追悼会上的另一幅挽联则是：“对领导待师友教同学，心怀坦荡，以诚相待；保遗产护文物做考古，鞠躬尽瘁，无怨无悔；横批：精神永存”。徐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徐先生的精神仍然留存在我们的心中，先生的事业仍为后人继续，薪火相传。

（据微信公众号“文博中国”）

山西大学第四届新年论坛：“云冈学建设与石窟寺调查研究”成功举办

凝聚智慧，共话发展。我校第四届新年论坛于12月26至27日在会议中心举办。论坛以“云冈学建设与石窟寺调查研究”为主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和设立“云冈学”的重要指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有关要求，由山西省文物局和山西大学联合主办，我校社会科学处、云冈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和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云冈学生态研究院承办。我校党委书记王仰麟、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副校长孙岩主持。

王仰麟代表学校向出席论坛的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他指出，山西大学作为一所扎根三晋大地的综合性大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做好云冈学研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学校五月份组建云冈学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建设云冈学研究中心，取得了扎实成效。目前，研究院获得“1331工程”重点支持，被列为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正式同意我校自主设置云冈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为下一步开展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通过新年论坛，进一步凝聚学界智慧，携手推动云冈学及相关石窟寺调查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学校将不负学界厚望，继续整合学科资源，集聚人才优势，强化科研创新，为加强云冈学研究体系建设，推动石窟考古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于振龙在致辞中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新年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具体举措，论坛以“云冈学建设和石窟寺调查研究”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对于传承中华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他表示，要通过经费支持、课题研究、科技保护和文创研发等方面探索石窟寺文物保护的新机制，与山西大学加深合作，携手推动山西省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论坛主旨报告部分由副校长杭侃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作题为“造像题记与有关研究”的学术报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静杰教授以“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思想”为题作学术报告。

“云冈学建设的工作进展”汇报部分由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主持。云冈石窟研究院副院长卢继文、山西大同大学云

冈学学院副院长赵华、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院长杭侃分别就目前云冈学建设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汇报。

论坛上，专家学者就“山西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多学科交叉视野下的云冈学建设”两个主题分会场进行了讨论交流，论坛特别增设评议环节，由专家进行点评。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畅所欲言，广泛交流，深入研讨，共同为推动云冈学建设与石窟寺调查研究蓬勃发展献计献策。

闭幕式由副校长杭侃主持，社会科学处处长侯怀银致闭幕辞。

省文物局、省考古研究院、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有关负责同志，省石窟普查有关单位代表，我校社科处、考古、历史、文学、哲学、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参加论坛。

其间，来宾参观了云冈学研究院、校史馆和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综合展览馆。

（据山西大学新闻网）



论坛现场



与会代表合影

山西大学关于自主增设“云冈学”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决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挖掘云冈历史文化内涵，推动我校考古学学科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及教育部办公厅《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规定，经学科设置方案论证、同行专家评议、教育部指定信息平台公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决定在考古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云冈学”目录外二级学科，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工作。

山西大学

2020年12月28日

山西大学图书馆成功申请《面向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研究——以云冈学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为例》课题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管理中心（CALIS）2020年11月31日发布的《关于发布‘CALIS 2020年度科研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山西大学图书馆申报的《面向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研究——以云冈学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为

例》，经CALIS管理中心专家评委最终审定，被立项为2020年CALIS科研课题。

该课题的申报是在“交叉学科”已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以及我校自主设立了“云冈学”二级学科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课题的研究周期为一年，研究主要以交叉学科——云冈学文献资源建设研究为例，通过对云冈学学科范围的科学定位以及云冈学研究人员的需求分析，广泛调查云冈学文献资源的分布情况。课题成果主要有三项：①课题报告，内容包括云冈学文献范围分析、山西大学云冈学文献资源保障率分析、云冈学学科的文献保障体系、交叉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策略及评价标准、面向交叉学科的文献保障体系；②云冈学文献目录一份；③搭建云冈学学科门户一个。

该课题的成功申报对学校云冈学学科发展以及云冈学研究院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杭侃教授所言“一流的学科要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做支撑，云冈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云冈学文献的支持”。课题将对云冈学文献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目录整理，并将根据研究成果采购大量的云冈学文献资源，不断跟进云冈学的发展动态，明确发展需要，为云冈学研究提供文献保障、学科服务等工作，持续性地为云冈学研究院提供知识、数据等服务，成为云冈学研究院的坚实后盾。

课题立项后，随即于2021年1月11日上午，在山西大学图书馆会议室召开了课题启动会议。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肖珑、副馆长杨光、研究馆员魏爱华等课题相关人员参会，课题负责人张洁主持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就课题的建设任务和建设成果展开了热烈讨论，肖珑馆长提出在进行云冈学文献资源目录收集之前首先要通过专家咨询、文献分析等方法明确检索词，明确云冈学的学科范围。其次，在目录整理方面不仅要注重文献目录数据的收集整理，还要注意测量数据的收集，为后期数字人文的加工做好准备。在云冈学文献目录的的收集方面，要注重地方性刊物、专业性刊物以及研究辑刊等相关文献的收集，外文文献要从Scopus和Absco数据库的相关文献入手进行完整收集，要尽量做到“求全、收全”。杨光副馆长对“建设成果”中“交叉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评价标准”以及云冈学学科门户建设方面提出了问题及意见。其他与会人员也对课题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及策略，会议气氛热烈。

最后，肖珑馆长指出云冈学文献资源建设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课题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后期仍要持续性地进行跟踪建设及分析研究，未来要将云冈学文献中心建设成为全国最全的云冈学文献信息、数据中心，成为多学科交叉的云冈学文献中心，也要成为图书馆学科服务、特藏服务的标杆。

（作者：山西大学图书馆 张洁）

云冈学文献中心购入《中国基本古籍库》

山西大学图书馆云冈学文献中心现已购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初）历代典籍及各学科基本文献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12,500个、20万余卷。每种典籍均制成数码全文，并附所据版本及其它重要版本之原版影像。合计全文17亿字、影像1千万页，数据总量约320G。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是世界目前最大的中文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系统，用户可通过多个检索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快速海量检索，完成校勘、标注、分类、版面调整、编辑、拷贝、打印等多项数字化古籍整理作业。《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云冈学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背景资料和基础型文献，为日后云冈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增强了文献保障。《中国基本古籍库》的购入对完善云冈学相关文献，促进云冈学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山西大学校内的用户可以采用以下方式使用该数据库：

1. 在山西大学图书馆首页的中文电子资源里面点击“中国基本古籍库”

2. 当前页面默认选择“古代典籍”，选择“登录”

3. 选择标红的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V7.0”，在下一页面选择“我已阅读”

4. 选择需要阅读的书目，在弹出的页面进行个人账号注册

5. 注册成功后，再次选择需要阅读的书目，在弹出的页面进行个人账号登录，方可阅读和下载。

（作者：山西大学图书馆 宋蕊）

2020年度文博界十大新闻事件

文化遗产让人们更加团结。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正是文化遗产提醒我们何为我们的代代相承的传统价值和文化基因。

今年，尽管遇到了新的挑战，中国的保护者和研究者们继续履行自己的庄严职责，悉心守护着我们的文化遗产。

《中国日报》梳理了今年文博界十大主要新闻事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指明中国考古学的新方向

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3.“考古中国“丰硕成果揭示早期中华文明

4. 紫禁城迎来建成六百年华诞

5. 更多流失海外的文物终于回家

6. 疫情当前，全国兴起“云上博物馆”

7.《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出台

8.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公布

9.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10. 全力抗洪抢险、保护受灾文物

（据微信公众号“国家文物局”）

全国首届前沿交叉学科论坛
前沿交叉研究院联席会举行

2020 年 12 月 12 日，全国首届前沿交叉学科论坛暨前沿交叉研究院联席会在南方科技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倡议发起并召集，由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主办，南方科技大学前沿与交叉科学研究院承办。论坛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全国负有盛名的交叉研究机构以及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与知名学者，包括 20 余位院士、150 余位学者专家及高校研究所的科研职能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员欣然应邀，共赴“前沿交叉之约”。

韩启德出席大会并作重要发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谢心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拥军，广东省科技二级巡视员周木堂等致开幕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汤超作大会主题报告、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部长张宁主持了下午的主题报告部分，北大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黄俊平出席并参加了研讨。



韩启德作大会发言

谢心澄在大会致辞中指出，近年来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集成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于今年再次调整学科门类，新增交叉学科作为第 14 个学科门类；基金委也在深化改革中推动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经过调研和筹备，于 11 月 29 日正式成立了交叉科学部。这也是时隔 11 年，基金委再次成立新的科学部。这是对知识生产方式和未来人才培养模式上的一种政策引领。目的都是



谢心澄致开幕辞

为了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引导和鼓励科研人员关注交叉科学问题，促进多学科交叉和多领域协同研究，推动新兴交叉领域取得重大原创突破，更好地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国自然基金委交叉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拥军为大家宣讲了基金委设立交叉科学部的设计思路与未来规划，受到了与会嘉宾的关注并引发强烈反响。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并最早设立交叉学科学位点的高校。汤超以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事例，分享了北京大学在促进学科交叉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南科大代理科研副校长、前沿与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赵予生，清华大学科研院院长方红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院长郭子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江雷，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贵瑞等依次作了精彩报告，分别就如何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在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组织协调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评价监督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看法。

其后在交流与讨论环节中，大会进一步就“以何种学术共同体的形式来组织和促进学科交叉”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中国交叉科学学会，认为当前我国交叉研究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教育部新增交叉学科作为第 14 个学科门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成立中国交叉科学学会正当其时。会议讨论决议在中国交叉科学学会正式成立运行之前，由全国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联席会代为行使其功能、义务及职权，秘书处常设于北京大学，汤超任秘书长，以负责相关事务的组织与交流。联席会将致力为学科的交叉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服务与沟通的桥梁和平台，将于今后每年举办全国前沿交叉学科论坛。

大会最后，韩启德作总结发言。他从

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分享了对交叉学科的认识：从开始没有学科，到 18 世纪之后，学科在不断细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整合。因此，学科的分离和融合，都是在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随着对重大问题的探究水到渠成、逐渐形成的，而非由人为划分或强行界定的。因此在推动学科交叉时，要尊重自然规律，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和根本，切忌一拥而上、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在学科交叉中本学科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聚集各学科中最优秀的人才做交叉。在实际组织时，从组织形式到评审机制都要做好改革，解决好交叉学科的同行评议等问题。而学术学风的建设，离不开整个社会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的土壤，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韩启德还就该如何确定交叉学科的主要交叉点和核心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认为交叉学科在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满足人民需求之外，应该更多地关注科学范式的转变，乃至为整个科学发展带来宏观改变，从而对人类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韩启德还对即将成立的全国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联席会提出了愿景，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界交流合作的平台，还是联系学术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纽带，为国家未来战略提出咨询意见。

13 日，大会还组织了与会科学家访问华为、腾讯、迈瑞等深圳代表性企业，让大家更为深刻与生动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与科技进步正在影响和改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至此，首届全国前沿交叉学科论坛暨前沿交叉研究院联席会落幕。首届论坛的举办为今后联席会的年度会议打响了第一炮，尤其是确立成立了秘书处与秘书长，将成为今后有效联合全国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新机制，为推动我国前沿交叉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



大会合影

厅校合作培养高质量文博人才
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成立

为培养适应湖北文物事业发展新形势的专业人才，推动湖北文博事业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1月9日，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与湖北大学共建的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成立。湖北省副省长张文兵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

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设在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并建立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与湖北大学领导和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商学院建设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等重大事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出任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名誉院长。

据介绍，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与湖北大学将整合资源，实现科研人员互聘、设施设备开放、业务资质共享，形成分工合作、联合攻关的优势科研与教育团队。

依据上述共建方式，双方将在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成立江汉文明考古研究中心，建设文博专业，申报文博专硕和考古学硕士点、博士点，建立教学实习基地及科研合作基地，开展国家、湖北省文物保护领域科研项目、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成立湖北省文博人才教育中心，根据全省文物事业发展需要，开展文博专业本科、研究生定向培养，开设在职研究生进修课程，开展全省文物干部的业务轮训、社会文物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文博行业从业再教育等培训工作；引入一批学科带头人、青年科研骨干，组建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质单位。

当天，江汉文明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博人才教育中心一并揭牌成立。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表示，将积极整合省内文博资源，在学生实习实践、文保项目、科研经费等方面积极为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创造条件，为实现文化强省建设，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做出应有的贡献。

（据“文旅中国”官网）

“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与修复学术论坛”举行

12 月 13 日上午，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与修复”学术论坛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论坛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本次论坛由洛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宋文献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明全、西北大学教授耿国华、洛阳师范学院校长梁留科、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陈建平等出席论坛。与会学者围绕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和修复、深化学术研究和价值挖掘、探索文物保护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展开研讨。

梁留科校长在致辞中介绍了洛阳师范学院在河洛文化、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研究的成果。他强调，洛阳师范学院高度重视此次学术论坛与签约工作，期待各方能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石窟寺遗址体系研究、国家重大项目联合攻关等多方面开展深入交流与合作，实现龙门石窟数字资源管理和共享共用。

周明全教授作了《信息时代的文化创新——从兵马俑复原到非常秦腔》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兵马俑的数字复原、中华古建数字保护与智慧开发、基于 VR 和 AI 的戏曲秦腔；并提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大学使命中的文化工程与人才培养。他表示，科技的不断进步发展使得文物保护方式多了起来，运用数字化保护手段，借助数字化采集数据实现文物本体虚拟展示及模拟修复，可以实现“文物活起来、走出去”。

陈建平副院长作了《龙门石窟数字化工作回顾与展望》报告，阐述了数字龙门的工作宗旨及发展理念，介绍了龙门石窟近年来在数字资源库建设、虚拟复原及展示应用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提出了未来建设具有基础支撑功能，融合保护、研究、考古、管理、展示工作为一体的数字龙门构想。

耿国华教授作了《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创新发展》报告，并介绍了西北大学在古人面貌虚拟复原、复杂外观文物数字化、考古遗址场景重建和展示、破损破碎文物虚拟修复、文化遗产的数字展示传播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展现了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用信息之手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播不断探索奋进。

梁留科校长以《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构建的设想》作了专题报告，介绍了近年来石窟寺保护与研究的背景，中原地区石窟寺概况和洛阳师范学院相关研究的优势，并从研究机构的创新、研究方向的细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的构建设想。最后，相关单位共同签署了《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与修复合作协议》。龙门石窟研究院、洛阳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将本着资源共享、长期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充分发挥三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技术优势，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为龙门石窟数字化保护与修复提供智力支持。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石窟寺”）



与会代表合影



论坛现场

北京大学文研院“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正式开启

2020 年 11 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开启。27—28 日，“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工作坊”在静园二院举行；28 日，“北大文研讲座”第 183 期“敦煌艺术与中国绘画史”在二体地下报告厅举行。

11 月 27—28 日，由北京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商务印书馆支持的“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工作坊”在静园二院举

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赵声良致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在为期两天的学术工作坊中，赵声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斗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荣新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小刚等十余位学者相继发表主题报告，聚焦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从考古、文献、历史、艺术、语言、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问题展开研讨。

11 月 28 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 183 期“敦煌艺术与中国绘画史”在二体地下报告厅举行。赵声良主讲，杭侃主持。敦煌壁画真实地反映了 4 世纪至 14 世纪的一千多年间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传世绘画极为罕见，存量丰富的敦煌壁画可以弥补中国绘画史上资料缺乏、刊布的高清晰画册有限、研究方法的陈旧等问题。讲座中，赵声良通过对敦煌壁画的调查，结合古代画史资料，辨识诸如东晋顾恺之以及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周昉、李思训等著名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而帮助听众全面了解中国绘画史的脉络。

百廿北大，涵养文化；千载敦煌，传承艺术。敦煌与北大，从 20 世纪初敦煌学的发端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就了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2019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共建“敦煌学研究中心”，联合培养高层次敦煌学研究人才，赓续历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官网）



“敦煌学与石窟寺研究工作坊”与会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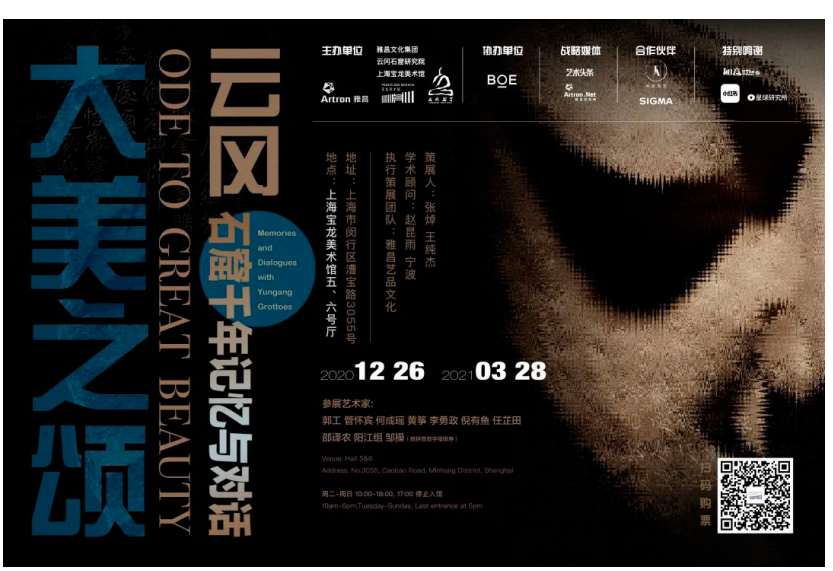
学术活动海报

“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盛大开幕

12月25日，由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院长、主任张焯和著名策展人王纯杰共同策划，雅昌文化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宝龙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展览于上海宝龙美术馆盛大开幕。

大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翟永清、山西省政府驻沪办主任韩侠、大同市文物局局长刘建勇、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省石质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院长、主任张焯，策展人王纯杰，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方锦龙，山西上海商会、新晋商艺术会会长杨纪文，雅昌艺术教育单元总经理肖伟文、宝龙美术馆副馆长吕美仪等出席开幕式。翟永清、韩侠、张焯、王纯杰、肖伟文、吕美仪为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上，主持人介绍了“云冈守护人”概念并宣布上海站“云冈守护人”名单，山西上海商会、新晋商艺术会会长杨纪文，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方锦龙获此殊荣，韩侠主任、翟永清副市长



展览海报

分别为获奖者颁发了奖杯。随后，主持人介绍了首届云冈石窟文创设计大赛相关信息，翟永清副市长宣布首届云冈石窟文创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此次展览，展出了80余件云冈臻品文物和利用3D打印技术1：1还原的全球最大单体石窟--云冈石窟第12窟音乐窟。除此之外，首次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板块，隆重推出10位中国优秀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构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对话。对此张焯院长表示，“这次展览吸收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进来，是一种历史传承与发展的新模式。云冈石窟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如今我们把它与今天的艺术品放在一起，虽然表面上是传统与现代，实际上是不同时代对先进观念的不同展示，这样可以丰富我们的眼界和认知。”王纯杰表示，“云冈是中西文化交融、对话后的成果。这种对话非常重要。不同艺术形态放在一起后，将产生新的创新，给予人们新的启发。”

本次展览，由雅昌文化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上海宝龙美术馆主办，京东方协办。展期将持续到2021年03月28日。

展览精心设计了4大单元板块，给观众带来极致化视觉体验：丝路寻佛记（文献）、匠心造丹青（文物）、石语破天惊（3D打印与数字互动）、化象之境（当代艺术）。

丝路寻佛记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凿成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吸收和借鉴了印度、中西亚文化，汲取希腊、罗马艺术元素，是不同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

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最初半个世纪的云冈研究，以日本学者居多，大村西崖、塚本靖、关野贞、常盘大定、小野玄妙等，主要探讨云冈石窟的建筑特征和艺术源流；中国学者则重在解析云冈历史与建筑，介绍邻邦的研究成果。

本次展览整理了一系列重要的出版物和老照片，记录了近百年来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文献及成果，从1906年伊东忠太的《国华杂志198号（支那山西云冈的石窟寺）》到2019年张焯的《云冈石窟全集》，可以感受到云冈石窟在中国建筑史和雕塑艺术史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

匠心造丹青

云冈石窟背依武州山，面对武州川，林渊锦镜，清幽精美。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余年。云冈石窟把一个王朝无尽的思想、无尽的语言和一个民族永远的灵魂雕进了一壁岩石，雕成了与人间相对应的丰富生动的世界。

本次展览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进行展示，分为石雕造像、陶塑、金铜造像、碑刻、建筑构件、器具、墓葬文物等七类，共计120件，并配以图文讲解。这些文物，构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北魏历史文化、

生活艺术等方面内容，让观众认识了解云冈石窟的独特文化魅力，呈现云冈石窟研究院学术研究成果。

跟随脚步往前，进入一条石窟文化长廊，这里包含北朝经典墓葬壁画、数字动画放映厅等多元化石窟文化展示板块，更设有大型文物修复模拟空间，观众不仅可以全方位了解石窟文化，还能近距离探秘文物修复现场。

一眼千年，光阴似箭，守护的故事里已过沧海桑田；对历史文物而言，再多溢美之词都显得苍白。文物并不是冷冰冰的摆件，它们有传奇的前世今生，它们是生活在民族血液中的基因密码，记录着我们的过去，也昭示着我们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是文物的守护者，每一件文物都是活着的传承。

石语破天惊

云冈石窟第 12 窟为廊柱式殿堂窟，俗称“音乐窟”，属于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中期工程，以其恢宏壮丽的伎乐雕刻、华美浪漫的艺术氛围著称于世。洞窟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室，前室北壁上方的天宫乐伎天手持各民族乐器，宛若一支“交响乐团”，集中反映出北魏宫廷乐队的时代风貌，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窟内现存乐器共有 14 种 49 件，大致可分为三类：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在千年的岁月里，鼓乐齐鸣、琴瑟相和的北魏梵声，彩带飘飞、舞姿曼妙的歌舞飞天，一直在塞外古都大同的星空低旋回响，无不体现着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

在展览现场，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完成的国内首个 1:1 可拆卸 3D 打印数字化石窟惊艳亮相。复原石窟高 8.5 米、宽 12.2 米、入深 14.5 米，由于体积庞大，且颜色特别丰富，导致扫描、测绘和搭建的难度极高。

历时 6 年，拍摄 55680 张照片，色彩还原度达到 95％以上，只为了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云冈第 12 窟音乐窟的宏伟魅力。

展览现场设有 VR 数字互动装置，用科技手段增加传统文化的趣味性，给观众带来极致化视觉体验。除此之外，展览还邀请了新媒体艺术家冯楚宸创作新媒体艺术作品——《观乐》。艺术家利用多媒体互动装置将沉睡千年的云冈石窟十四乐伎唤醒，他们身着幻彩络腋灵光再现，手持古乐器争相演奏。

在这个声乐世界里，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存，现实、神话和信仰同在，远古艺术与现代科技在同一时空下对话，所有边界被模糊、被跨越。观众可以看到更多难得一见的细节，与古代音乐人互动，共同演奏一场跨时空跨地域的时尚视听互动现场。

化象之境

本次展览邀请了著名策展人王纯杰，为展览引入当作艺术作品，通过绘画、影像、装置、雕塑、行为、摄影、声音等多元方式展开这一场跨时代的艺术对话，探讨传统艺术中“意象”及“意境”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如何启迪创意和激发新的可

能性。

当代艺术版块共展出 10 位艺术家的 20 余件当代艺术作品，他们从佛学文化中得到启迪，并通过装置雕塑、录像行为、绘画书法等多样性的艺术语言来呈现他们的感悟和体验。他们的创作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和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整体联结在一起，推衍而逐层呈现出：自然与人的合一之境：时间维度转换的过程之境；有意与无意间的心身贯通之境。以空间、时间、意识三层维度的迭加，交织成当代艺术语言的化象之境。

人类没有任何一种思想，
不被建筑艺术写进去。
作为西来像法，
在中华大地绽放出的第一朵奇葩，
云冈石窟兼容并蓄，融汇贯通，
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
都能对之产生联想和共鸣。
云冈石窟是独具魅力的艺术史研究课题，
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求知欲，
走进这场中国文化之美的殿堂，
感受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
探索中国经典文化艺术，
领略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

（据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



开幕论坛，中为张焯，左一为王纯杰，左二为宝龙美术馆副馆长吕美仪
右二为著名艺术家郭工，右一为雅昌云冈项目负责人武林

“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开展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第一专题展厅，由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深圳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星龛奕奕翠微边——洛阳龙门石窟魏唐造像艺术展”与公众正式见面，展期将持续至 2021 年 5 月 23 日。

这次展览筹备已久，为庆祝深圳特区建立 40 周年和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 周年的盛事，踏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等重要指示，加强区域间文化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深圳博物馆共同谋划、深挖内涵、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力为公众奉上一份精神文化盛宴。

上午，展览新闻发布会在博物馆一楼召开，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扬分别致辞。

史家珍表示，深圳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为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世界各地观众品味岭南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龙门石窟的精品文物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荟萃之地来到现代高科技产业的汇聚之所，穿越时空与公众交流，对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丝路文化和黄河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叶扬讲到，此次展览是深圳博物馆整合国内资源，在年末精心为公众奉上的一个重磅大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龙门石窟用了“三个最”的评价，即“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充分展现出龙门石窟在国内外石窟寺中的重要地位。这次展出的文物种类丰富、精品云集，无论是从价值还是体量层面考量，都是极其难得的珍品，希望公众们能通过展览领略到中国顶尖的石刻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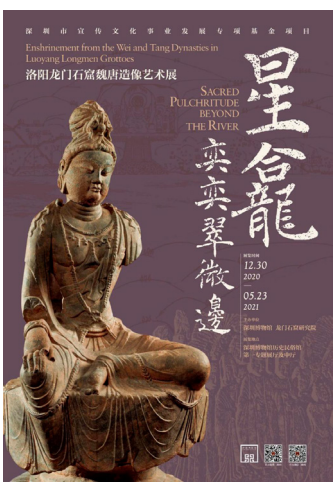
此次展览共分为“孝文革新——北魏龙门石窟的开凿与艺术”“东都政治——唐皇室与龙门石窟造像的鼎盛”“文物归来——海外流失龙门造像的回归”三个部分，汇集了龙门石窟研究院院藏的 76 件龙门石窟相关藏品，其中一级文物 15 件、二级文物 23 件，珍贵文物占比非常高。通过高树龛主尊佛首、舒相坐菩萨像、力士像、僧怀则幢塔等魏唐造像艺术中的精品文物，同时结合古阳洞原真 3D 打印窟龛、龙门石窟全景漫游等，较为全面地描绘出龙门石窟魏唐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征。

展厅中，文物布局巧妙：部分文物按

照洞窟内佛教造像的形制进行组合，呈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佛二胁侍菩萨”等布局；部分被陈列在成排的龛形中，星光熠熠，巧妙再现了山间崖壁中“星龛奕奕翠微边”的意境。建筑仿古，灯光暖黄，佛像庄严，营造出宁静安详的氛围。数件超大体量、超重量级的佛坐像，更是镇馆之宝，其宝相庄严、气势恢宏，令人顿生平和敬畏之心。

龙门石窟大规模开凿始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经北魏隋唐及此后历代的营造，两岸崖壁上的窟龛星罗棋布，南北绵延长达 1 公里。龙门石窟现存编号窟龛 2345 座、造像 11 万余尊、碑刻题记 2800 余品。是唯一一处跨越北魏和盛唐两个中国古代造像高峰期的皇家石窟，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之多样、雕刻之精美、蕴含之深厚而蜚声中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石窟寺”）





展览海报



新闻发布会现场

云冈学何为？
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老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A 座 101 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第二部分是云冈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对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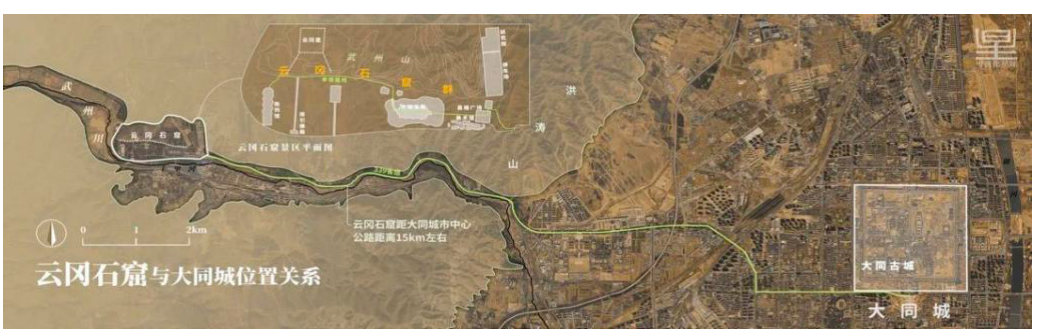
主讲人杭侃老师

一、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

讲座伊始，杭侃老师从空间位置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对云冈石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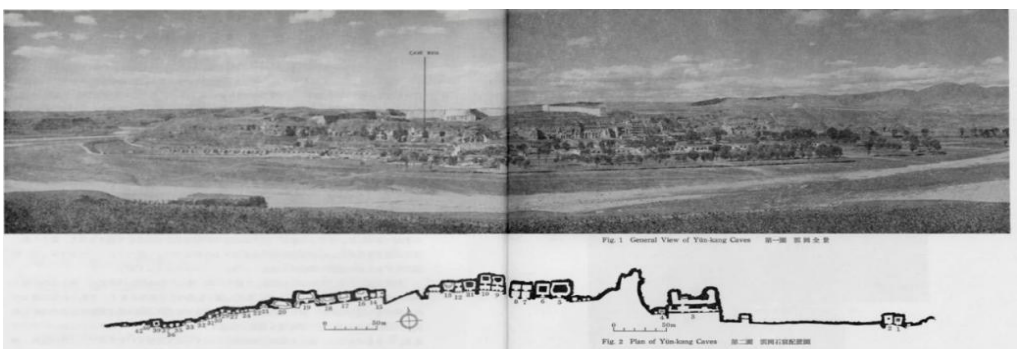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 16 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大小窟龛 252 个。造像以自然谷沟为界分为东、中、西三区。云冈石窟规模宏大，雕刻艺术精湛，于 2001 年 12 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 252 个，造像 51000 余尊。代表了公元 5 世纪至 6 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之后杭老师对北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北魏是公元 386 年由鲜卑族拓跋氏



云冈石窟与大同城位置关系图（图片采自可视化星球公众号）

建立的王朝，386 年拓跋珪建都平城，改国号为大魏；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493 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 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中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统一北方的同时还进行了灭佛运动，景穆帝拓跋晃进行劝阻，并缓宣诏书保护僧人逃离，其中便包括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至文成帝拓跋濬（440-465）时期，又进行了复法、开窟活动。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年幼称帝，与冯太后展开斗争，但以失败告终；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有一个时期与冯太后并称二圣。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成组双窟的出现、释迦多宝双佛并坐题材的暴增这两个现象便与二圣有关。



抗战时期日本人拍摄云冈全景及测绘平面图

谈到云冈石窟这一全新的石窟模式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杭老师推荐了宿白先生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平城既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包括工巧在内的各种人才；又具有雄厚的佛事基础，包括建寺造像的丰富经验；还和早已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还密切，包括佛像画迹的传来。有了这些条件，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 7 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研究提供了标准尺度。

同时杭老师指出，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石璋如先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至敦煌石窟进行考察，以此次调查为基础整理的《莫高窟形》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在台湾公开出版。石璋如先生在调查研究中便非常具有问题意识，对敦煌石窟开采量及石材去向进行了关注。书中对于具体洞窟的记述特辟窟级和窟积两项，窟级为使读者一看即可了解本窟的大小，以该窟全窟的面积为标准，并算出平方公尺 ×0.3025，



杭老师团队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作成坪数，每五坪作为一级，三级作为一等，从而将敦煌洞窟分为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石璋如先生还系统考虑了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工程问题，对窟积进行了计算。其中一个大的结论是诸窟之容积共66119.83 立方公尺，这个数字为出乎意料之外的少，盖由于小窟太多之故……从以上数字显示，丁等窟占大多数，也就不怪了。这个 66119.83 立方公尺的数字说明莫高窟的上寺、中寺、下寺所占向东凸出的一大块较高之台地，就是由窟中所挖出的土方堆积而成。对比云冈石窟的开采量，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宿白先生所说的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了，这是中国工匠第一次大规模在石头上进行高浮雕。

二、云冈石窟的研究

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洞窟即所谓的昙曜五窟（460-465 或 460-470）；第二期洞窟一般认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471-493）；第三期洞窟开凿于迁都洛阳到北魏正光年间（494-525）。昙曜五窟现编号第 16—20 窟，是由昙曜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是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雕刻的五尊大像。《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这一时期的造像身着袒右式、通肩式袈裟，具有西方佛像服饰外观。云冈二期洞窟是像第 7、8 窟或 9、10 窟那样模仿木构建筑的塔庙窟和佛殿窟。这一时期完成了石窟中国化的进程，佛殿、帐幔、服饰等都符合汉族的审美特点。第三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小规模石窟。

近代重新发现云冈石窟，始于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 1902 年对云冈的考察，向海内外学者介绍了云冈石窟，遂引起世人瞩目，此后陆续有一些发现与研究。云冈石窟考古工作之前，日本人水野清一、长

广敏雄于1936年春首先对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了为期各约一周的调查，此项工作为云冈大规模的考察作了准备。1938年，水野清一、羽馆易和徐立信等组成五人团队，对部分洞窟进行了一些考察、发掘工作。此后调查工作逐年进行，1938～1944年共调查七次。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石窟调查也告终止。1951-1956年《云冈石窟》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行，凡16卷32巨册，全文英译。1975年，该所又出版单行本《〈云冈石窟〉续补第十八窟实测图》，2006年又对报告中未收录的当时调查所得的瓦、陶器、瓷器等出土遗物进行了补充，出版《云冈石窟——遗物篇》。

徐苹芳先生将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与50年代以后。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现代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遗迹进行调查记录和学术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的，一般只是拍照、测绘现状和临摹壁画。而石窟寺这类历史遗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考古学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石窟寺是否应该纳入考古学的范畴，即是否要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寺研究，就成为现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宿白先生对考古学在石窟寺中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研究程序：①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②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③分区分期的研究；④关于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杭老师还以宿白先生与长广敏雄之间关于《析津志》中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的学术论证为例，强调了考古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以及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就，杭侃老师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从新角度来研究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在砂岩上，保存下来的题记很少。但云冈石窟的三期洞窟中均存在着大量的补凿龛像、打破关系和未完成的窟龛，这些遗迹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题记留存很少的云冈石窟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因此，他希望学界对云冈石窟的打破与补凿遗迹、未完成的龛像进行调查和记录（包括文字描述、摄影、部分实测等），并整理、编辑调查报告。他尝试对云冈石窟各洞窟的年代、洞窟原来的布局设计，和洞窟中后期的开凿工程进行考察，从而从一个以前没有加以系统注意的角度，推动云冈石窟的进一步研究。比如关于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的讨论，杭老师认为，从遗迹现象的打破关系来看，昙曜五窟当初是计划把第19窟作为主窟，按照昭穆制在左右各开两个洞窟。不过，工程进行途中第20窟发生了崩塌，因此将本来应该修建在第20窟西侧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东侧，也就是说16窟原来计划开凿在21窟位置。中央第19窟是太祖道武帝，按昭穆顺序，左侧第18窟为第二代明元帝，其次右侧第20窟为第三代太武帝，下面本来作为左端的第17窟是太武帝之子景穆帝，最后本来作为右端的第16窟是景穆帝之子文成帝。

此外石窟内还有一些未完工现象，部分洞窟的装饰以及造像的轮廓、服饰部分

已经完成，但面部尚未雕刻，可能是最后才进行面部开光这一步骤。所以一个大型石窟工程的开窟时间和完工时间可能会间隔很久，甚至涉及到停工。为了研究石窟中一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还于巩义进行了佛教实验考古，对巩义石窟的一个北魏龛像进行了开凿复原。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引发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开凿工程量以及石料去向等问题。细化至具体问题，我们还可以思考第 5、6 窟是否是一组双窟。第二期石窟中，一般认为 7、8 窟最早（471 ～），9、10 窟次之（484 ～ 489 年），5、6 窟已经快到迁洛时期（486 ～ 494 年）。5 窟主尊是云冈石窟里面最大的，肯定是皇家所开，第 5 窟和昙曜五窟的形制接近，同样是马蹄形窟，主尊占据了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题材上以三世佛为主，背光火焰纹依旧属于第一期的样式。第 5、6 窟开凿的时间可能有间隔，第 5 窟的右壁和第 6 窟的左壁最薄的地方只有 2 厘米，现在有个地方都已经通透了，这种情况只有第 5、6 窟有，可能是开凿有先后，出现设计上的不周造成的。推测第 5 窟开凿的时间应该紧接昙曜五窟，装饰纹样等辅助性装饰是献文帝时期完成的，后因某种原因中断了工程，孝文帝亲政后完成了大像部分，所以这个石窟表现的不是一个时期的风格。另外岩体规划、云冈的洞窟排年、北魏时期云冈的面貌等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同时杭老师简单介绍了对昙曜五窟开凿工程的重新思考，包括选址、斩山、设计、施工以及昙曜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在选址时利用河流阶地以减少工程量，并且选在最宽处，以使窟前面积最大化。另外，这条河流旁还有一条通往和林格尔的路，在交通方面也很便利。《魏书 • 释老志》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可见当时工匠对大型石质工程的石质还不够了解，斩山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可能有多次改造，这种现象在云冈中也常常见到，比如中区一线大窟与相邻的 13-13 窟以及 16 窟附近等，这些在考虑洞窟排年的时候都需要思考。昙曜在设计时，选用的题材为三世佛，以宣传佛法。使用的窟形为大像窟，模拟皇帝。此处有一逻辑问题，即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为什么没有采用凉州和敦煌早期流行的中心塔柱窟呢？杭老师认为文化的传播不一定是线性的，中间还可能会有“插播”的现象，有待专文探讨。至于窟型是仿草庐还是毡帐，杭老师更倾向于是毡帐，是一种创新，突出帝王的地位。另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石窟开凿的很多，但是窟前并没有多少位置，那么平城时期的僧人居住的寺院在哪里？考古工作发现云冈石窟东西两侧以及顶部都有北魏时期的寺院分布，也有辽金时期，所以说那个时期的僧人是住在山顶的，呈现《水经注》所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之景。

三、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谈到云冈学的建设，杭老师认为应该从云冈在历史中的地位出发，建设的内容

可以借鉴敦煌学的内容，但云冈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各有其侧重点。具体而言：

1、敦煌学研究的内容是区域性的，云冈学的研究内容是全域性的。敦煌位于边关，而云冈是位于都城的。

2、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侧重微观，云冈学的研究内容在做微观研究的同时，需要对北中国地区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遗存做宏观的研究。

3、云冈学和敦煌学都研究石窟，云冈石窟尤其是其迁都洛阳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洞窟，是皇家意志的艺术化表现，出资开凿者为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敦煌石窟多中小型洞窟，其出资开凿多为地方官员和僧侣。

4、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内容是其出土的文书，云冈学的研究内容除了正史，还有平城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在云冈模式影响下在北中国地区出现佛教遗迹和碑刻题记。

新材料会带出新问题。云冈学的建设，在城市与聚落、民族融合、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会不断提供新的材料。而云冈学的建设需要依靠山西省内尤其是大同本地的考古和文物资源，对平城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都要有充分的关注。

进而，杭老师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考察山西云冈时讲话的重要性，“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杭老师将云冈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总结为三个层级，分别是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讲座尾声，杭老师表达了对云冈学建设的愿景。首先是基础资料的呈现。基础资料的呈现面临许多困难。手工测绘效率低，但是我们也无法依赖先进的测绘手段，因为测绘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对象加以认识的问题，人认识不到的问题，测绘机器不会帮助人去辨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全国从事石窟寺考古的专业人才很少，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总之，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任重而道远。另一个愿景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包括考古学（中古时期考古、佛教考古）、历史学（民族融合、古代社会治理、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美学）、物理（岩体力学）、化学（文物保护）、地质、中文（民俗与方言）、美术（雕塑、从人文角度的美术史研究）、音乐（音乐史）、生物与医学（古DNA、同位素等）、旅游（文化遗产活化、文化创意产业）、计算机（大数据）等。进行云冈学研究要有大的知识体系，多参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能故步自封。

最后，杭老师表达了对云冈学未来建设的信心，并以宿白先生的话与大家共勉——“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据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逢山开路！调查山西石窟寺！

提起山西的石窟寺，最闻名遐迩的，便是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等“大咖”石窟了。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虽然没有上面这些石窟名气大，但山西的石窟资源其实遍布全省各地，从北魏到唐代，再到宋、元、明、清，历代均有开凿，不但分布广泛，而且体系完整、内涵深厚。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山西有石窟寺达到244处，摩崖造像254处。然而，山西还有若干石窟和摩崖造像未被记录，进行全省范围的复查、调查和登录，并采取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和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2020年11月13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石窟寺保护的部署，山西省文物局组织启动了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对全省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不可移动文物展开调查研究。本次调查重点，为宋代以前的石窟寺，包括：对已发现的石窟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对新发现的石窟寺进行登记测绘。

于是，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支专业而精干的调查队伍迅速奔赴山西的山间田野。这次调查由四支队伍共同实施。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临汾、晋城。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负责阳泉、晋中。云冈石窟研究院负责大同、朔州、忻州、吕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负责长治、运城、太原。由于石窟寺大多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工作任务重、强度高，又正值寒冬，北方多地已开始降雪，调查组的工作异常艰辛：他们要在积雪难融的山路上开车，在陡峭的山上攀爬，忍受荆棘、尖刺在身上划来划去，在看似结实但一不小心就会踩空的冰面上行走，有时还会遇到山里没信号，APP定位无法使用，无法准确找到目的地，只能一遍遍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寻找……与冰冷的石窟相比，他们身上是文博人火一样的热情和温度！

截至12月17日，各小组现场完成石窟寺调查107处，其中新发现9处。目前，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
调查组正寻找石窟的路上

野外调查和数据信息登录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预计，2021 年 3 月底前，将完成野外调查和登录工作，2021 年 4 月到 6 月间完成整理汇总和调查报告编制工作。到那时，一个权威、丰富的山西石窟寺图谱和群像，将出现在大众面前。

（据微信公众号“文博山西”）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调查组正在测量石窟



云冈石窟研究院调查组正在记录石窟数据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云冈石窟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2021 年 1 月 7 日大同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主任会议通过）

大同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云冈石窟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了满意度表决，获得通过。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条例》施行以来，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合理利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市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了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和合理利用的永续发展。但也要看到云冈石窟保护整体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条例》的贯彻实施上还存在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实力有待加强，保护与利用矛盾逐渐凸显，宣传力度尚显不足等问题。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条例》贯彻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加大对《云冈石窟保护条例》的宣传教育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活动，扩大社会宣传覆盖面，提升《条例》的知晓度和保护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石窟保护工作的法治氛围。

二、坚持保护第一，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石窟保护规划和管理，坚持保护第一，科学适度利用。云冈石窟研究院应继续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效合作，持续推进石窟保护、研究、利用。要按照省委建构“云冈学”的战略规划，在云冈文化前期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要高起点、高标准推进“云冈学”及云冈学学院建设，开展高水平科研创新，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云冈学”中心。

三、加强政策倾斜，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各级政府应为云冈石窟研究院引进人才开辟绿色通道，在经费、人才、项目等方面给予全力倾斜支持。云冈石窟研究院要创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符合遗产地文物保护和管理需要的新模式，提高保护研究队伍专业化水平，支持和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扎根云冈，真正使人才留得住，

扎下根。

四、严格开放管理，提高展示服务水平

通过科技手段对洞窟进行全面监控，合理测算、从严核定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和重点洞窟的最大瞬时容量，并采取多种方式调节控制游客量，推广预约参观制。要加快洞窟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实现洞窟数字化采集全覆盖，提高电子技术和数字化应用水平，通过建设数字博物馆、探索数字洞窟游览技术等，提高展示服务水平，提升游客参观游览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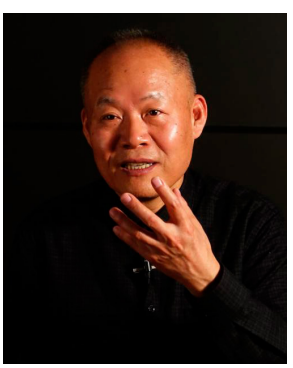
五、整合优化资源，拓宽发展渠道

要深度挖掘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内涵，将实物展示与历史文化传播有机结合。要提高景区云冈石窟陈列馆等各类场馆的利用率，以文化旅游业为带动，整合吃、住、行、游、购等各项服务，从而把云冈石窟丰厚的文物资源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据微信公众号“云冈石窟官微”）

郝春文：敦煌学流光百年，历久弥新

敦煌的世界 敦煌里的中国：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新书访谈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光明悦读：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正式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何谓“敦煌学”？

郝春文：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含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哲学、宗教、考古、语言、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其特征一是交叉性，二是因地命学。“敦煌学”这个名词，在陈寅恪先生之前，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大阪怀德堂夏期讲座上也用过，但影响不大，并未流行，只具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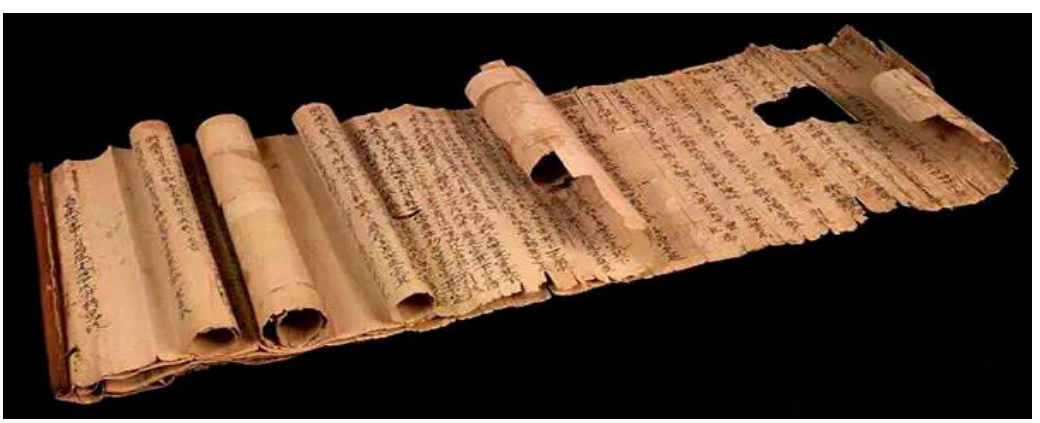
故意义。陈先生独创的“敦煌学”虽晚，因其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在中国学术界不胫而走，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

光明悦读：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对我国敦煌学研究百余年历程做了详尽梳理。

郝春文：如果从1909年中国学者出版第一批有关敦煌学的著述算起，中国的敦煌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9年至1949年，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敦煌学逐步兴起，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第三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四个阶段是2001年至现在，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学者在延续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的同时，开始着力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光明悦读：敦煌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填补了哪些空白？

郝春文：历史学方面，首先是依据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公私文书的研究，改写了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敦煌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使我们对这一时段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变迁、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交往有了全新认知；其次，对文献中有关唐代均田资料的深入研究，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认识；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勾检资料的研究，填补了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研究的空白。宗教史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生活的真实图景，探明了摩尼教在古代中国的传入和流行情况。语言文学方面，对敦煌俗字的研究填补了4-11世纪写本俗字研究的空白；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则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来源问题。敦煌石窟艺术方面，历时千余年的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结合的文化遗存，使学界对4-11世纪中国美术史有了全新认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筮宅凶吉法》

识。此外还填补了中古时期写本装帧形态研究的空白。

光明悦读：您在新书中不止一次提出，我国已经掌握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依据何在？

郝春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度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改变这样一种状况的标志，是推出了一系列在国际学界都有意义的成果。

资料整理刊布方面，中国学者编纂并陆续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等一系列大型敦煌遗书图集，陆续公布了中、英、法、俄和部分国内外散藏敦煌遗书的图版。释文方面，中国学者陆续推出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一系列分类释录文本，基本涵盖了敦煌遗书的重要类别。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编纂出版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等一系列记录敦煌石窟的基本资料。敦煌遗书的资料整理和刊布方面工作，几乎被中国学者垄断。

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或开创性论著。总结性著作代表有《归义军史研究》《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摩尼教及其东渐》《敦煌俗字研究》等，梳理先学、启迪来者。开创性论著代表有《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唐勾检制研究》《佛教大藏经史》《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等，每部著作都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光明悦读：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原因是什么？

郝春文：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焚膏继晷、奋起直追。一大批中国敦煌学家长期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埋头于资料整理等具体的学术研究，既不为世俗之功名利禄所左右，亦不为功利性甚强之学术评价体系所绑架，一心一意，醉心学术。如方广锠教授为调查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曾遍访英、法、俄、日、美等诸多敦煌遗书藏家，成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而默默无闻的出版人，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摄影师和编辑，在国外拍照和整理敦煌遗书时，白天上班时间忙于拍照和著录，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冲洗照片、检查拍摄质量，昼夜不分。正是由于不懈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局面。

光明悦读：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与国外敦煌学研究相比，特点是什么？优势与不足分别是什么？

郝春文：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敦煌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有义务比外国人研究得多一些、好一些。但我们同时也欢迎外国学者开展敦煌学研究。我们的理念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在，我国的敦煌学在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地理、敦煌语言文学、敦煌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梵文、于阗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学者还不够多，水平也与国外尚有差距。即使在我们占有优势的领域，国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选题视角等方面也能给我们宝贵的启示。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全世界各国的敦煌

学家有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我们和外国的敦煌学家是在同一对话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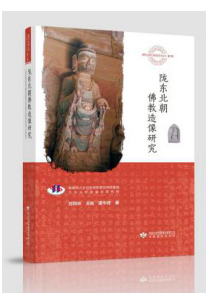
光明悦读：怎样挖掘敦煌文化历史遗存背后的思想？又怎样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郝春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 4 世纪 -11 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 700 年的时间段，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其所蕴藏的精神，具有追求宏大和厚重、女性开放和张扬、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态度等几个鲜明特征，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充满活力的脉动。那些楚楚动人的菩萨、勇猛刚毅的天王、精美绝伦的绢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古代文书，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向我们诉说着先人曾经创造的辉煌。而这些，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最好教材。

对敦煌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如我国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饮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借鉴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美术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据“光明日报”）

书刊推荐



《陇东北朝佛教造像研究》
作者：董华锋
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8

简介：

本书通过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题记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识读、梳理和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北朝石窟和造像龛的窟型、龛型及各石窟寺的分布状况；同时结合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时代审美风尚，对陇东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作了深入探究和详细总结。全书资料详实，引用论据充分，图文并茂，结构合理，逻辑清楚，语言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本书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对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年坚守，浙大张涌泉教授团队让敦煌文献“孤儿回家”“亲人团聚”

那个写着“敷已”两个字的敦煌残片，是徐州工程学院的朱若溪注意到的。

那是几年前，她还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读博士。在翻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她发现一个编号为“北敦2301号”的敦煌残卷，卷首贴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只有“敷已”两个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敦煌卷子抄写的是《金光明经》卷二，对比传世文本可以知道，其中并没有“敷已”二字接连出现的情况。她想，这张小纸片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的，也许来自裱补在卷子背面的废纸——古人常把废弃的旧纸用作裱补的材料。

她的导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看到这张纸片时，脑子里跳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段话：“佛告具寿阿难陀：‘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时阿难陀受教敷已……”这里的“敷”有“铺设”之意，“已”表示完成，后面一句是说，阿难陀根据佛的吩咐铺设好了座位。仔细揣摩这张残片，“敷”字前还残留着一点笔画，很像“教”字的下半部分。这张残片会不会来自《金光明最胜王经》？

顺着这个思路，朱若溪开始排查。查到“北敦3894号”敦煌卷子时，有了线索。这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一处残损，“教”字只剩了上半部分，将那张写着“敷已”的残片填充进去，刚好就可以连成“时阿难陀受教敷已”。不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来，就连纸片右侧残存的墨迹也有了归属——来自前面经文的“陁”“汝”二字。

这种拼合，学者习惯称之为“缀合”。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让“孤儿回家”，让“亲人团聚”，这是近10年来浙江大学张涌泉团队的主要工作。他们的研究显示，超过25%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

汇集敦煌残卷 拼接起古代文明

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残缺不全，有学者统计，比例超过了90%。“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对于缀合，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学大家、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曾有过这样的论断。

缀合，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系统全面的缀合，需要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汇集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难有这样的条件。20世纪30年代，

姜亮夫和王重民、向达等中国学者曾到欧洲抄录、拍摄敦煌卷子，但终究无法将海外敦煌文献全部“搬运”回国。那时，中国藏敦煌文献也尚未完全公布。如今，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四大馆藏敦煌文献大多已经公布，系统全面的缀合具备了基本条件。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新朋在跟随张涌泉读博士时，梳理过最晚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一张未定名的残片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张残片的正面，还剩 9 行字；背面是很不完整的图画，左侧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右下像城池的一角。这让他想起了许多知名敦煌学者曾经讨论过的法藏“伯 5019 号”和国图藏“北敦 11731 号”，那两张残片也都是一面文字、一面图画，有学者将它们缀合在一起，定名为《孟姜女变文》。这个编号为“俄敦 11018 号”的残片，从正面可以识读出“遂共其妻执别”“丈夫须慷慨”等文句，或许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关。

缀合的结果，证实了张新朋的判断：将“俄敦 11018 号”置于“北敦 11731 号”的左侧，不但残片正面分离的文字可以合而为一，背面原本断裂的山峰、河流也都得以接续。

“将这 3 张分藏在俄、中、法的残片缀合后，我们恍然大悟：正面部分不是像大多数古籍那样从右向左读，而是应该从左向右读，依次讲述了夫妻话别、丈夫服役、客死他乡的场景；背面描绘的是修筑长城的情景。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这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张涌泉回忆，“20 多年前研究伯 5019 号的缩微胶卷，因为文字严重残缺，胶卷卷面又很暗，难以卒读。这 3 张残片的成功缀合，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

先把内容相关的敦煌残卷汇聚在一起，再将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残卷进行比对，碴口是否相合、字体是否相同、装帧是否一致……在实践中，张涌泉团队系统总结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大大提升了缀合效率，新的缀合成果不断涌现。

“目前的缀合结果显示，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对超过 30000 号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缀合后，张涌泉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界估算敦煌文献的总数为 70000 号，按此推算，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 17500 号以上。

“张涌泉教授团队缀合了一大批敦煌文书，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敦煌文书缀合。这是真正的学术推进。”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认为，张涌泉团队总结出的敦煌文书缀合方法和经验，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对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缀合敦煌文书也会有很大帮助。

回到历史现场 探索藏经洞之谜

“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这个结论意味着，除去约 6% 基本完整的卷子外，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敦煌卷子无法缀合。张涌泉一边做着缀合，一边思考着为什么那么多残卷不能缀合，这或许可以成为解开“藏经洞之谜”的一把钥匙。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为什么封闭？是什

么时候封闭的？为何在如此狭小的石室中，存放了如此丰富的文献？自 1900 年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起，人们就在不停地追问这些问题。120 年后，张涌泉给出了新的答案。

“藏经洞文献在流散过程中，的确有人为造成的撕裂，但比例应该不会太大。”随着缀合研究的深入，张涌泉认为，藏经洞中保存的写卷，很多原本就是残缺的，“公元十世纪，一位名叫道真的僧人从敦煌各寺院、道观、学校以及官府搜集了大量残卷，将它们存入藏经洞，为修复做准备。一些经书修复后，转移到寺庙去供养、诵读，剩余的复本和残卷断片，继续留在藏经洞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文献中留下了道真的一段话：“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在缀合过程中，张涌泉团队发现了不少古人对这些残卷“修补头尾”的线索。

国家图书馆藏“北敦 5679 号”，抄写的内容是《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颇为完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卷首的五行字与后面的文字字体不同，而且有拼接的痕迹。

“这卷《佛说佛名经》原本缺‘头’，有人从其他地方找来相同的内容，补在这个地方，使之成为完整的卷子，这就是道真说的‘修补头尾’。”张涌泉认为，道真之所以强调“修补头尾”，是因为那些经常翻阅的经书，卷头和卷尾更容易破损，是修复的重点。

巧合的是，张涌泉指导的硕士生刘溪，找到了这卷经书“原装”的“头”。那是国图藏“北敦 11567 号”，虽然仅存 3 行，不能与“北敦 5679 号”直接拼合，但与其字体相近，卷心高度相同，而且首行写着“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

“可能是因为这个卷子原本的‘头’破损过于严重，在修补的时候被裁去了，而改用一张写有相同内容的纸来代替。”张涌泉团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千年前修复典籍时的场景。

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实例，张涌泉有了对于“藏经洞之谜”新的解答。

“张涌泉关于藏经洞性质的新看法，有全面调查梳理敦煌文献的坚实基础，有全面调查的数据作为论据，比以往的各种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如此评价。

虽然受到很多专家的肯定，但张涌泉还有一些遗憾：不少敦煌文献，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照片，而无法获得高清、彩色图版，这给缀合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缀合后图版的逼真度也有所欠缺。他相信，随着更多高清、彩色敦煌文献公布，他的团队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据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

文物保护看基层:“保护好大足石刻就是为人们留住‘乡愁’”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造像始建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盛极于两宋，1999年12月，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石窟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保护这些散落在山间、裸露在外面的石刻造像成为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工作者一直不断探索的主题。

12月10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保护看基层”（重庆）主题宣传活动来到了大足石刻。第一站就到了位于进山古道崖壁的佛祖岩石刻大殿。

与宝顶山大佛湾其他石刻不同，佛祖岩石刻属于宝顶山大佛湾中的中小石刻，石刻开凿于南宋，是一个结界石刻造像，和宝顶山造像是统一构思，统一设计建造的。记者看到，造像顶部有明代题刻“古迹佛祖岩”，造像保存完好，身上还有一些彩绘，非常漂亮。大足石刻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启兵告诉记者，该造像建成后经历过数次保护，现在造像外面的大殿就是研究中心在2017年修盖的，同时还配备了安防系统。通过安防系统，研究中心的监视室可以时时监控石刻的状况。

宝顶山以大佛湾为中心，遍布于四周2.5公里范围内，类似这样的石刻结界造像点还有十余处，“我们正在对这些石刻进行照相记录、简单测评，调查保护状况、管理状况、安全设施状况，通过这次调查，用1-2年的时间使宝顶山文物安防措施达到全覆盖。”邓启兵说。

作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不仅仅是宝顶山，大足石刻共有75处大大小小的石刻分布在山水之间，想要实现保护全覆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黎方银在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几年，他们每年都拿出1000多万元经费，选取几个石窟进行安防措施建设，因为数量比较大，所以从今年9月份，他们启动了大足石刻中小型石窟保护三年滚动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把这75处石刻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2021年将启动21处。

据了解，2008年，大足石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成，这是我国第一个多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安全技术防范系，使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刻形成了

人防、技防、犬防为一体的全天候立体防护体系。在此基础上，2015—2016 年，宝顶山石刻安防升级改造系统建设工程完成，实现了宝顶山重要区域的全方位视频监控覆盖、多重报警手段综合利用、监控报警联动等多种技防手段。同时，还建立了市级文保单位及重点区级文保单位的安防平台。通过安防平台的搭建，将分散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整合管理，提高了安全技术防范水平。

除了技术安防，人防也很重要。

“我们在全区聘请村级义务文保员 62 名，建立起区、街镇（部门）、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坚持专业巡查与群众守护相结合，确保了文物安全。”黎方银告诉记者，这些义务文保员有的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罗开洪，就是当地负责保护佛祖岩石刻的一名义务文保员，今年 46 岁，他刚刚从父亲手中接过义务文保员的工作，“以前我经常陪父亲一起来这个地方，打扫卫生，如果天气不好，就察看渗水情况。现在我是义务文保员了，更有责任看护这些石刻。只要有空，我就过来看看。”说起文保员的工作，罗开洪很自豪。

“义务文保员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实这个义务文保组织从 50 年代就开始建立了，这种网状的文保组织对文物保护有一个基础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很多情况我们都不会知道。”黎方银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现在，大足区政府与街、镇及有关部门签订了文物安全责任书，明确了各级、各部门的文物安全责任，将文物管理工作纳入了年终政府目标考核。通过采取专业守护与群众守护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巡视巡查。

“即使是很小的石窟，我们也要把它保护好。全面改善中小型石窟文物保护管理现状，让 68 处散布的中小型石窟成为留在人们心中不忘的“乡愁”。”黎方银说。

（据微信公众号“国家文物局”）



佛祖岩石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 / 摄

本期同仁学术栏目刊布了云冈学研究院首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李零教授，云冈学研究院顾问杨泓教授、温玉成教授、王邦维教授的研究成果。四位学者的简介如下：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学和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兵器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史。

温玉成，河南省龙门石窟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学。

王邦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梵语、梵语及汉语佛教文献、佛教文学、中印文化关系史、中印文学、印度和中国佛教史、印度历史与文化。

商周铜礼器分类的再认识

□李零

【摘要】本文讨论商周铜礼器的分类。所谓铜礼器,只限铜容器,不涉及乐器、工具和武器。研究分类,功用最重要。研究功用,自名是重要线索。首先,作者指出,铜器铭文常见的尊、彝二字是铜礼器的通名,而非专名。其次,把商周铜礼器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食器,食器下分肉食器和饭食器,重点讨论鼎类的,以及簋与盨和瑚与簠的关系。第二类是酒器,酒器下分缩酒器、温酒器、酌酒器、饮酒器、盛酒器,重点讨论爵的分类和定名,以及爵字的两种写法,并涉及祼、瓒、爵三字的区别。第三类是水器,水器下分盥器、沐器、浴器。盥是洗手,沐是洗发,浴是洗澡。第四类是鸟兽尊,即动物造型的铜器。这类铜器往往背上起尊,有些还带小簋盖。鸟兽尊只是这类铜器的俗称,并无自名根据。人们往往以为这类铜器都是酒器,其实有些是食器。

器物分类，可以材质分，可以形制分，可以纹饰分，但最重要还是功用。研究功用，器物自名很重要。

《周礼·春官》有司尊彝一职。青铜器

铭，“宝尊彝”最常见，食器、酒器、水器，各类器铭都用，可见“宝尊彝”是通名，而非专名。这三个字连在一起，意思是值得珍藏或保有，可以敬献的祭器。

礼书所谓“尊”，语焉不详，字或作樽。汉代有一种筒形带盖的酒器（旧称“卮”），自名“酒樽”。今之所谓尊，至少分三种：“罍形尊”“觚形尊”“觶形尊”，与这种“酒樽”无关。礼书所谓“彝”，含义也很模糊。“彝”非敞口簋，今已纠正，但学者仍把“罍形尊”“觚形尊”“觶形尊”统称为“尊”，并保留“方彝”的叫法，这两种器名都是没有根据的。

食器分肉食器和饭食器。

肉食器分为煮肉器和盛肉器：①煮肉器：鼎、鬲皆三足器。三足器皆用以炊爨。鼎、鬲都有自名，定名没问题。鬲与鼎，区别有二：其一，鼎大，实足；鬲小，款足，器形不同；其二，鼎实曰牲，鬲实曰羞，功能不一样。牲，全牲曰牷，半牲曰胖，解体后的牲，不同部位有不同名称，都是大块的白煮肉。羞是碎肉加菜加调料，调和滋味，很好吃。当然，鼎也可以盛羞。战国秦汉以来，羞越做越精，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鼎，往往盛羹酱，羹酱即属于羞。②盛肉器：豆。豆分方圆，以圆为主。豆有自名，定名没问题。豆，主要用来盛肉，特别是菹醢，菹醢即肉酱。古书常以俎、豆并举，俎是用来切肉的案子，也说明豆跟吃肉有关。

饭食器分为蒸饭器和盛饭器：①蒸饭器：甗。甗分方圆，以圆为主（方甗为四足器），下鬲上甑，用来蒸饭。甗自名为献，定名没问题。②盛饭器：簋、盨、瑚、簠。簋是盆形器，以圆为主，偶有方器。类似器物还有盆、盏、盂，旧多入于杂器类。盨是方器，功能类似簋。出土器铭，簋可称盨，盨可称簋，盨簋或连言。瑚，即瑚琏之瑚，亦方器。盖器相同，属于最早的双合器。这种器物，西周就有，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器名多异写，或从匚从古，或从金，古又作钴，又作故，又作害，又作𣪊，又从皿从钴。瑚，旧释簠，沿误已久，现在已经扳不过来。簠是豆形器。圈足低矮，往往镂空，有点像今之果盘。它与豆不同，不是盛肉，而是盛饭，器形相似，器实不同。簠确实是圆器，而不是方器。宋人以瑚为簠也是错误的。此类器物，



图 1 上蔡郭庄 M1 出土有盖撇足大鼎



图 2 日本私人藏“觚形尊”及其铭文

簋最基本，盨、瑚是衍生，它们都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类的米饭，簠是饭食器中的豆形器，对应于肉食器中的豆。

酒器分为缩酒器、温酒器、酌酒器、饮酒器与盛酒器。

缩酒器：同（旧称“觚”）。礼书所谓“觚”，据说是一种爵，容量比爵大，相当爵的两倍或三倍。这种“觚”，并非今之所谓“觚”。今之所谓“觚”，据 2009 年发现的内史亳丰同，自名是同 。

温酒器：爵（三足爵）、“角”、斝。礼书所谓爵，据说是一种一升的酒器。爵分足爵和废爵（《仪礼·士虞礼》），足爵是三足爵，宋人定为爵，沿用至今。三足爵，敞口、平底、三足、两柱、一銎，前有宽流，后有尖尾。我怀疑，两头都是流。礼书所谓“角”，据说是一种容量为四升的酒器，比爵的容量大四倍 ，恐怕也不是今之所谓“角”。今之所谓“角”，器形类似爵，不同处是两头俱尖，无柱，出土发现，数量比较少。这种器物尚无自名发现，礼书所谓斝，字或讹为散，据说是一种容量为五升的酒器，夏人叫琖，殷人叫斝，周人叫爵 。可见爵、斝是同类器物。今之所谓斝，敞口、平底、三足、两柱，一銎，确实与爵有很多共同点，但没有流。

酌酒器：爵（勺形爵）。爵，除三足爵，还有勺形爵。勺形爵，器形作斗勺状，杯口前端或以雀鸟为饰，杯口后有短柄，有如雀尾。勺是章母药部字，爵是精母药部字，古音相近。勺形爵有柄无足，出土很多，与酒器中的斗勺相似，但柄较短，可能来自商代就有的带柄杯。

饮酒器：饮壶（饮罐、耑）、杯。真正的饮酒器是什么，仍然值得探讨。我认为，主要是觶和杯。礼书所谓觶，据说是一种容量为三升的酒器 。今之所谓觶，器形类似壶，口微侈、细颈、垂腹，有圈足，自名饮壶或饮罐。杯，字亦作桮或盃。杯从木旁，很多都是漆木器。汉代的杯，如马王堆汉墓所出，都是椭圆形，两侧带双耳的耳杯。这种耳杯，战国已流行，如临淄商王墓地所出，自名为钖，钖是铜杯；郭家岗一号墓所出“东宫之不（杯）”是漆木器，自名为不。耳杯的前身是 ，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盛酒器：“尊”（分属罍、同、觶）、壶、罍、“卣”（提梁壶）、“方彝”、“觥”。礼书所谓“尊”是某种酒器的专名，不是通名。汉代有一种器物，旧称卮，自名是“酒樽”，可能就是这种尊。它与商周时期的“尊”完全不同。壶是最传统的酒器。商以来的壶，一直保持着共同特点，小口大腹。壶有自名，定名没问题。出土发现的罍，属壶形器。商代两周、战国秦汉都有罍。罍的典型特征是，肩饰涡纹圆枚带，两侧有耳，腹部有一个穿鼻（但也有无穿鼻者）。出土发现的“卣”，亦属壶形器。这种器物，器形与西周金文中的卣字差距甚大，反而与西周金文中的壶字更接



图 3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提梁“方彝”

近。“卣”分方圆、高矮、胖瘦很多种，其中一种作直筒形，裘锡圭考证，可能即汉器鋞（古书亦作锺）的前身，未必是酒器。出土发现的“方彝”，并无自名依据，器盖类似方罍。出土发现的“觥”，前有流，后有鋬，上有盖，样子有点像带盖的匜。这种器物尚无自名发现，功能可能类似匜。

上述酒器几乎都有方圆二体。方器比圆器尊贵，数量相对少一点。东周楚、曾、蔡等国高等级的墓葬，尊缶、壶、鉴，方圆二体是配套使用，作为固定组合。

水器分为盥器、沫器、浴器三种。

盥器：盘、匜、盉、鉴。这四类都有自名，定名没问题。器铭有“盥盘”“盥匜”“盘匜”“盘盉”等词，都跟洗手有关。盘、匜或盘、盉是固定组合。人洗手，通常持匜或盉，从上往下浇水，手在盘上接着。匜、盉有流，都能倒水，这是共同点。但盉有三足，可以烧开水，匜无足（或只有为了保持平稳附加的小足），不能烧开水。盉，器形与汉代的鐎相似，旧称鐎，应纠正。盉有方盉。西周所谓鉴，与盉类似，但往往有类似西北三足器的三个小袋足。鉴见清华楚简《封许之命》。

沫器：盘、鉴。这两类有自名，定名没问题。器铭有“沫盘”“沫盉”，未见“沫匜”。“沫盘”是当脸盆用，“沫盉”是用来浇洗脸水。鉴是脸盆，可以鉴容，可以洗脸，可以洗发，特别大者还可当澡盆。楚墓，鉴分方圆，配套使用。盘、鉴是类似器物，器名可以互借。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器形是大型方鉴，而自名为盘，有人认为可以当洗澡盆。

浴器：浴鼎、浴缶。这两类都有自名，定名没问题。浴鼎是烧洗澡水的鼎，器形与鬳的鬲部相似。浴鼎也叫汤鼎。汤是热水。古人把热水、温泉和浴池、澡堂叫汤，日本现在还这么叫。浴缶是盛洗澡水的缶。浴缶和尊缶不同，形体矮胖，似与徐、舒流行的平盖缶有关。商代铜器也有矮胖的缶，学者叫瓿。过去，学者曾把浴缶叫瓿。缶与瓿可能确有关系，但东周时期叫浴缶。浴缶式的器物，有些自名盥缶，盥缶是盛洗手水的缶。洗手的水一般是凉水，洗澡的水是热水，此其不同也。

鸟兽尊：宋代复古，最重六尊六彝。六尊六彝之目见《周礼·春官·司尊彝》。六尊是献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六彝是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些器名该如何理解，异说纷纭。献尊、象尊、鸡彝、鸟彝、虎彝、蜼彝是一类，为动物造型，著尊、壶尊、大尊、山尊、斝彝、黄彝是一类，为普通造型。器物作动物造型，各国多有之。出土发现，商周铜器有所谓“鸟兽尊”，这个名字是容庚起的。其造型有犀、象、虎、兔、马、牛、羊、豕、鹰、鸮、鳧、雁、鱼等多种，有些还是想象的动物，如张家坡 M163 和石鼓山 M4 所出。这类器物，多数都是背上开口，加带提环的椭方形小盖，但也有作圆口圆盖者，盖如簋盖，甚至还有背上起尊者。宋以来的仿古铜器常作动物造型，背上起尊，过去以为向壁虚造，今观晋侯墓地出土的兔尊，可知有所取法。这类器物，人多以为酒器，未必。如晋侯墓地出土的猪尊，铭文作“晋侯乍（作）旅飤”，显然是食器。

（节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 年第 11 期）

探索的途程

——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现和研究

□杨泓

中国的美术考古，根植于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对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回顾，总会引致许多令人痛苦的往事，我们的叙述还得从20世纪初开始。

当人类历史刚迈进20世纪，古老中国西北边陲的一次偶然的发现，轰动了中国文化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6窟长甬道北壁一个被封闭的小窟（后来习称“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古代写本、绘画和其他文物。可惜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也无力保护民族文物瑰宝，敦煌藏经洞的宝藏立即吸引了外国探险者贪婪的目光，不仅敦煌藏经洞宝藏中的精品多流失国外，而且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自甘肃至新疆古丝路上许多重要的遗址和石窟，都屡遭列强的探险队、考察队的践踏和劫掠。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情况才逐渐起了变化，进入20世纪20年代，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才在中国开始萌发。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首次田野发掘开始于1928年10月，到1937年，先后进行了共15次发掘，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发掘的工地，或者可以被誉为培育中国现代考古学者的摇篮，海峡两岸的考古学的前辈，绝大多数都在那里开始了他们探究中国考古学的行程。夏作铭先生就是从那里开始迈进考古研究的门槛的，他曾不止一次回忆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就在这处考古圣地出土的遗物中，含有不少美术品，从此伴随着科学田野考古发掘的兴起，中国美术考古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途程。不幸的是，方兴未艾的中国田野考古发掘，被战乱所阻隔，帝国主义对中原大地的军事占领，中断了以殷墟发掘为代表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虽经抗战时期大后方学者的努力，曾清理了成都前蜀王建的陵墓，开展对敦煌莫高窟的调查、临摹，并对附近古墓进行发掘，等等，但并不能改变中国田野考古的艰难的处境。直到40年代，中国考古学园地呈现一片寂寥情景。

“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这是郭沫若先生为米海里司著《美术考古一世纪》中译本写“译者前言”时



图 1 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墓主坐帐壁画

发出的慨叹，时为 1946 年 12 月 16 日。那时郭先生还指出：“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就考古发掘方面，大地实在是等待得有点不耐烦的光景了。这样的工作在政治上了轨道之后，是迫切需要人完成的，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一部世界完整的美术史，甚至人类文化发展全史，就缺少着中国人的努力，还不容易完成。”在那以后不久，1949 年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树立了划时代的里程碑，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考古学寂寥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考古学者踏遍神州大地，到处留下了汗迹和足印，打开了一座又一座幽闭已久的“地下博物馆”。通过这些新开启的“窗口”，人们得以窥视被岁月湮没已久的古代奥秘。中国考古学的园地上已是生机蓬勃、繁花似锦。学者们瞩目于寻究新的考古学文化，致力于考古学年代学和类型学的考索、分期与分区的研究，进而追寻文明的起源，或是探察城市发生和发展的轨迹，研讨新技术的产生及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除了考古学的断代研究以外，被列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还有史前学或史前史、金石学、铭刻学、甲骨学及古钱学等，在考古学园地上培育着一丛丛争芳吐艳的奇葩。但是在这园地中一直存在着被学者忽略的寂寥的一角，就是美术考古学。

令人困惑的是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条目分类目录，不能找到“美术考古学”这一条目，特别是不被列入“考古学分支学科”的条目之中，这自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记得当时我曾就此问过夏作铭先生，他说他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属于特殊考古学，但目前在中国的研究还欠成熟，这可能就是未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条目的原因吧！不过还是会在适当的地方提及美术考古学的。确实后来在他与王仲殊先生合写的该卷总领条《考古学》中，在论及“特殊考古学”时，指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

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在“考古学”卷中正式论述美术考古学，也仅有这一段简短的概要论述。自那次谈话以后，夏作铭先生还曾多次向我谈起过有关中国美术考古学的话题，指出若对这方面有兴趣，必须先进行最基本的工作，正如盖房子，先要将地基清理好。这些谈话使我颇受启发，因为在考古园地中美术考古学这寂寥的一角，并不仅是缺乏规划和管理，首先必须由园中的粗工清除杂物乱石，为荒芜的土地开垦施肥，才能供那些能巧的园丁去栽培花木。

最初的尝试，是在李松先生鼓动下承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文字虽不精深，总算填补了这部百科全书中缺乏“美术考古学”条目的空白，完成了一桩宿愿。在那段简短的文字里，我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发展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同时认为“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但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前。宋元以后，由于历史文献日益丰富，存世遗物品类繁多，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因此在美术考古研究中不再占主要位置”，并将美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简单地概括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五类。对这五类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美术品，也作了极粗略的简介，自然也没有忘记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差别”。今天看来，这些论述虽感过于粗略，但大致概括了有关美术考古学的主要方面。



图 2 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女侍壁画

提到研究美术考古学，主要依靠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这些都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令人感兴趣的是对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常常主要依靠遗物中的美术品，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史前考古学中的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以及历史考古学中陶俑的形

态特征的变化。依据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以及其相对年代。20 世纪 60 年代苏秉琦先生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据以划分区域类型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特征容易识别的彩陶图案，在文中着重指明庙底沟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最重要的是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彩陶盆和双唇小口尖底瓶，它们都具有特征容易识别、形制发展序列完整的特点，其中前两种器物都是考古学遗物中的美术品。还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植物花纹彩陶图案，指出：“植物花纹中，构图比较复杂，序列完整的有两种：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蔷薇图案是从比较简单朴拙到比较繁复严密，再到松散、简化、分解。鸟纹图案是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形态），到象征。”它们都各自包括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消亡的完整过程，成为显示其所属文化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器物。我们追寻蔷薇图案彩陶在各地的分布，自然廓明了这一文化类型的中心区域和分布范围，为区域类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于依据随葬陶俑的类型、特征及其组合变化，进行墓葬埋葬年代的判断，则更为大家所熟悉了。我还曾依据纪年唐墓中随葬的镇墓天王俑甲胄的特征，进行排比分析，从而阐明了唐代明光铠的发展演变规律。因此对于美术考古的深入研究，对考古学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美术考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研究中华古文明的光辉传统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古代文明犹如光灿的巨星，运行于众星争辉的世界历史寰宇之中，在它经过之处留下了一条永不磨灭的光辉的轨迹。今日由于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更有条件去追溯中国文明巨星升起的原始，以从神州大地发掘出土的众多古代文化宝藏，将中国古文明的光辉轨迹重现于世人面前，指引人们面向未来去进行新的求索。这些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宝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的古代美术品，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永放光彩。在这方面，美术考古学研究肩负的任务是繁重的。

（节选自《中国美术》, 2016 年第 1 期）

书刊推荐



《参差集》

作者：杭侃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简介：

本书文字简炼，通俗易懂，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图文并茂地普及考古文博专业知识，使广大读者能学习掌握一定的考古文博信息。全书共分为考古之思、从源到流、源头活水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多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都阐述了一个大众感兴趣的、有关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学概论

□温玉成

【摘要】本文从佛教的源流入手,介绍了石窟寺的产生、兴起与分布以及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等。重点梳理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自南北朝至清代的发展历史,同时从类型学、年代学、田野调查、考古报告撰写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传统石窟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宗教考古是以有关宗教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属于历史考古学领域。欧洲的基督教考古学、北非西亚的伊斯兰教考古学、亚洲的佛教考古学，是宗教考古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考古工作，始于十九世纪末叶。百余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0 年 6 月），四万余卷古代卷子面世，渐次形成的“敦煌学”，是以研究古代宗教文献为主的新学科。另一方面，“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所作的古建筑调查中，发现了一批古代寺院及古塔等宗教建筑。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西安青龙寺、洛阳永宁寺遗址。中国的佛教考古工作，基本上是以石窟寺的调查、研究为中心课题。中国佛教考古学是一门前沿的、交叉性学科。它以极为丰富的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诸如石窟、造像、寺院、碑刻、古塔、经卷、法器、壁画，各种形态的曼荼罗、佛教工艺品等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领域又与美术史、古建筑、宗教史等学科相交叉。有时还需要古文字学知识。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5 世纪古印度奴隶制发达的十六国时代。他的创造者却是北印度一个不属于十六强国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族姓）• 悉达多。佛教所证悟的解脱之道是“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佛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宗教与哲学体系：原始佛教时代，从佛教诞生到佛陀灭度一百年内；部派佛教时代，也是小乘佛教发达期，这时演化出许多部派；大乘佛教时代，约起自公元 1、2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密教时代，约起自公元六七世纪。

石窟寺艺术产生于古代印度，这就是在大山的峭壁间开凿出来的僧舍和寺院，它只是释迦牟尼及弟子们坐禅的场所，称为“石室”（自然的或简单加工的）。印度石窟寺大约有 1200 个，四分之三属佛教石窟。佛像的出现大约在公元 1 世纪前后。由大夏人、大月氏人联合建立的“贵

霜帝国”(Kushna)是佛教造像诞生的地区。笈多王朝(Gupta，320-646)以后，印度教获大发展。犍陀罗的灰泥佛教塑造艺术，开始于公元一世纪。

文物普查资料显示，我国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分布于境内24个省市区，在世界上，可谓数量最多，分布面积最广，延续时间也最长。中国早期的佛教石窟(禅窟约起于西晋；造像窟起于十六国时代)，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若干政治中心分布的。东汉后期，中国出现了佛教图像。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接受佛教，是创造出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理论”，用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佛教，从而公元1-3 世纪存在一个“仙佛模式”时代。克孜尔早期石窟的形制，是方形洞窟，稍晚出现了大像窟，就是贴崖面前凿出10多米高的大龛，龛内用泥土堆塑成高浮雕式大立佛(现无存者，均已塌毁)，佛像之前，接木结构建筑。有学者指出，中国石窟可分为“禅窟”及“造像窟”两大历史阶段。造像窟大约始于五世纪初的秦州地区。学者们又把内地的早期石窟区分为“秦州模式”“凉州模式”“云冈模式”和“龙门模式”。佛教艺术的犍陀罗式，通过古代西域传入汉族文化区；笈多式，最早见于青州市造像。它们融合为一种新类型的佛教艺术。敦煌艺术就是这种新型佛教艺术的典范之作。分裂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是石窟艺术风格大变化的时期。东魏、北齐的邺下佛教，继承了洛阳的佛教传统。所谓具有胡风、“面短而艳”风格，就是北齐、北周时期的艺术特征。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中国佛教宗派大都于此时成立，竞标异彩，佛教艺术也到了鼎盛阶段。隋唐造像的艺术风格，明显分为两大系统，即东都(洛阳)系统与西京(西安)系统。川北广元、巴中等地隋唐造像，属西京系统。与东都系统不同的是，在布局上，力士的地位高于天王；往往浮雕天龙八部于主像之间；造像更加活泼；弟子及菩萨手中持长柄香炉、香瓶、仙草等物；像座束腰部分加长并饰以花绳等纹样。隋唐时期的石窟改变了北朝石窟以禅观为中心的状况，成为社会各界祈福禳灾之所。隋唐时期的石窟改变了北朝石窟以禅观为中心的状况，成为社会各界祈福禳灾之所。开凿造像的“功德”用来表达人们忠、孝、节、义的观念，“儒释之混”渗透到当时社会各阶层。因此，石窟中不但造像，而且有刻宝塔、刻经文、刻药方用作功德者。到中、晚唐，各类形象趋于程式化，神韵稍感不足。

敦煌在宋、西夏、蒙元时代仍有大批石窟雕造。

佛塔是佛教徒礼拜的中心、寺院的中心。中国的“塔”一词，来源于犍陀罗语。东汉塔的形状，见于四川画像石上；西晋塔的形状，见于玉雕件。五胡十六国时代，信佛的国王，往往在京城筑造“七级浮屠”，以示崇佛。嵩山法王寺隋塔、唐代的西安大雁塔最有名气。辽代的佛塔，分布于辽宁省、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等地，十分精美。各地窖藏佛像的出土年代下限都在北宋。用“战乱说”“灭佛说”“废弃说”都解释不通。实际上，是北宋采用一种藏舍利式的“圣藏”。

蒙古族进入中原，首先接受的是禅宗及华严宗。藏传佛教造像严谨，遵从《尺

寸经》。明代雕刻技艺大大衰落。虽然仍有小型石窟的开凿，已是开窟造像活动的尾声了。

西藏佛教艺术考古，中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藏、汉学者考察了西藏岩画，寺院、石窟。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对寺院古建筑及壁画做了大量调查分析，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我们在西藏、青海、川西、滇北、甘南高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重大成果。

从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到中国的克孜尔、伯孜克里克、敦煌、炳灵寺、云冈、龙门，再到朝鲜庆州，宛如一串璀璨的宝珠，点缀在亚洲大陆，放射着艺术的灿烂光芒，记录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窟中的碑刻，早已引起金石学家的注意，而对石窟的记述则盛于清代。朱彝尊记大同云冈，全祖望记晋南窟龛，袁枚记安西榆林窟，徐松记敦煌及新疆石窟等，张澍记大足石刻等等，皆属此类。叶昌炽在《语石》中，考察了佛教造像题材的变化及邑社的问题，惜语涉简略。佛教石窟考古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探索研究石窟寺的方法问题上，经过长期积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石窟寺中的雕塑品和壁画无疑是艺术品，对此能否应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研究，长期以来存在怀疑的观点。人们所惯用的依据“艺术风格”的断代方法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随意性。近年改用考古学分期断代法，认为敦煌有隋窟 80 个，就比原来准确些。石窟考古学就是用考古学的方法（主要是层位学和类型学）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和遗物的学科，它是历史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应用时，要充分注意石窟美术的连续性，选取具有一定规模并有连续性的石窟群做排年研究，并以纪年窟龛为划分时代的参照系。不排除图像学的运用。石窟考古学为综合研究石窟寺的历史、宗教和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宏观上，石窟考古重视石窟群体总立面的总平面遗迹的分析；在微观上，石窟考古又很重视石窟文物各类因素的细微变化，寻找有代表性的、明显的变化特征。

石窟的考古学记录是运用多种手段对石窟作全面系统的科学记录，它不同于其他专门学科的调查记录。石窟的考古学记录的理论标准是依据此项记录可以复原该石窟。记录者应有较多的知识，因为感觉到的物象不一定能认识。石窟的考古学记录主要分为野外工作和室内整理两个方面。

石窟的考古学报告既是该石窟的客观报告，也是执笔者对该石窟初步研究的结果。一般来说，《报告》由下述八部分组成：前言、石窟的位置和结构、开创时期的造像和壁画、晚期的造像与遗迹、年代分期与题材分析、结语、附录、外文提要。

石窟的考古学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类型、分期与年代学研究；②宗教、历史（含地方史）、地理和艺术四类基础知识；③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以时代为断限、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来比较印度、中亚、新疆、内地的文化艺术之差异的专题研究。

（节选自《大足学刊》2018 年第二辑）

“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王邦维

我想先解释一下题目，首先是“西化”二字。“西化”就是“西方化”。我这里说的西方，是《西游记》中唐玄奘要去的“西方”，中国古代又叫作西天、身毒，天竺、天竺，从唐代的玄奘开始，叫作印度。因此，这里的西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印度化”。

中国地处东亚，在这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如果不算近代的这一两百年，外国，外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对中国发生过最大的影响，与中国在文化上关系最为密切，有过最多的交流？我想，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非印度莫属。之所以说这两个文明具有原生意义，是因为他们自成体系，受到外界的影响比较小。这两个文明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点：其一是几千年来延续不断。其二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体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表现出来的坚忍性、更新力和很强的创造力。

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中国和外部世界接触，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发生的影响最大，后果最重要的，其实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另一次是明代从后期开始有所接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才真正开始的与欧洲文化，或者叫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文化的交往。

下面进入我们的正题：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与我们这个题目有关的，第一是佛教史。可是要讲佛教的历史，内容很多。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在各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中，《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书中的《西戎传》的记载最为可信，就是有名的“伊存授经”的故事。当然，关于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也还有其他的说法。“永平求法”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我想提到两本用英文写的书，这和我要讲的主题有一点关系：第一本书的书名是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作者是 E. Zürcher，中文名字许理和。另一本书是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作者陈观胜（Kenneth Chen）。我举例这两部书，

是想以此作为提示，说明一部佛教传入中国和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既可以说是“西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化”的历史，二者其实是互动互补的。文化交流的最后结果，既不是完全的“西”，也不是完全的“中”，是“中西结合。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就举一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与我这里讲的“西化”和“中国化”都有关的事例。第一个例子：出家人即佛教僧人的地位问题。在印度，出家人地位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国王，一般都很尊敬出家人。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出家的僧人应不应按世俗的规矩，向国王敬礼，成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政府对宗教从来就实行直接有效的管理，中国自南北朝起，政府设立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僧人出家、僧籍等事物。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家宗教局。

第二个例子与社会的伦理观念有关。印度古代的传统，讲人的一生，应该或者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最终归于解脱。这样的终极目标具备一种神性或神圣性。中国人就不大一样。中国人的目标一般来说很现实，主要是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或者有时被认为是对君主的责任。如果不敬父母，不敬君王，叫“无君无父”，问题很严重。佛教的出家，与此就有矛盾，但佛教又不能没人出家。因此中国的佛教虽然有出家人，但不管出家在家，讲孝都讲得比较多。

第三个例子：思想与学术潮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能简单提出几点。一是魏晋时期中国的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二是佛教的禅宗，这是一个佛教概念从引进到吸收，最后“中国化”的过程。我只提另外一件一般人不太注意到的事，与我自己的专业有关，就是：古代的中国人对外国语言性质的认识，最初主要是在翻译和理解佛经的过程中开始，这种认识，进而应用到对汉语本身性质的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第四个例子：夷夏之辨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来源上讲，佛教从印度传来，不是“国货”，属于“夷”的范畴，而不是“夏”。中国人接受了佛教，不就等于“夏”变于“夷”了吗？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一段时间，这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题目。儒家的思想是中国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于是反对佛教的儒家的学者就和道教的道士一起，都在这一点上攻击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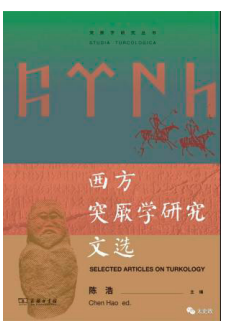
其他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佛教造像和石窟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佛经翻译与语言交流对汉语的影响等。所有这些，无非是要说明，从印度方面讲，佛教传到中国，使中国一定程度上“西化”了，但佛教在中国，也被“中国化”了。

人类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化，总是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非如此不能进步，非如此不能发展。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推动这个过程，促进这种进步。用过去常讲的一句套话，这才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件事。如果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既存在所谓的“西化”的过程，同时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们一直在“中国化”和“西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希望在中国现有的文化背景下，既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又能加以改造，使之

成为我们中国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回顾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中华民族只有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去接受外来文化，才能在保持中华文化本体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中华文明。

（节选自《民间文化论坛》2016 年第 5 期）

书刊推荐



《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作者：陈浩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0 - 10

简介：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 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日本云冈石窟研究著作目录（二）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	出版单位	卷号	页码
五台山、雲崗、天龍山を訪ねる旅	秋田 光兆	山家学会紀要	山家学会	5/2002-12	13-26
雲岡石窟第6窟中心柱の仏伝説話浮彫について--「布施」図像の創出の問題を中心に	安藤 房枝	美学美術史研究論集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美学美術史研究室	13/2008	33-62
雲岡第6窟の圖像構成について：佛教圖像に焦點を當てて	安藤 房枝	東方學報（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85/2010	704-730
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雲岡石窟と日本人美術家(2)柳瀬正夢と長谷川三郎を中心に	五十殿 利治	芸術研究報	筑波大学芸術学系	29/2008	35-45
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雲岡石窟と日本人美術家(1)柳瀬正夢と長谷川三郎を中心に	五十殿 利治	芸術研究報	筑波大学芸術学系	28/2007	31-42
雲岡の塔洞と健駄羅の精舎	飯田 須賀斯	蒙古	善隣協会	15/1940	
支那建築の拱に關する一考察：附雲岡第九窟門は閨か	飯田 須賀斯	東方學報 東京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11-3/1940	
晉北訪碑行報告	飯山知保	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査研究報告	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57/2012	1-30
内蒙古・山西・寧夏・陝西・甘粛調査（二〇〇五・〇六年）	石見 清裕	東方學	東方学会	113/2007	154-163
雲岡中期石窟新論－沙門統曇曜の失脚と胡服供養者像の出現	石松 日奈子	MUSEUM		587/2003	
雲岡中期石窟新論--沙門統曇曜の失脚と胡服供養者像の出現	石松 日奈子	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	東京国立博物館	587/2003-12	25-47
雲岡石窟の皇帝大仏：鮮卑王から中華皇帝へ	石松 日奈子	國華	國華社	122-2/2016	
Book Review 雲岡石窟寺院研究の新展開--岡村秀典編『雲岡石窟 遺物編』	伊藤 淳史	東方	東方書店	305/2006-07	22-25

论文题目	作者	期刊	出版单位	卷号	页码
支那山西雲岡の石窟寺	伊東 忠太	國華	國華社	197、198/1906 年	
雲岡石窟の佛教說話浮雕:本生・因緣圖を中心に	稻本 泰生	國華	國華社	122-2/2016	
雲岡石窟調查記	雲岡石窟調查班	東方學報京都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3-1/1942	96-122
雲岡石窟調查記 -- 昭和十八年度	雲岡石窟調查班	東方學報京都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4-1/1944	146-159
雲岡石窟調查記 -- 昭和十九年度	雲岡石窟調查班	東方學報京都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5-2/1946	139-148
北支考古學調查班報告	大山柏	史學	三田史学会	17-2/1938	175-177
雲岡石窟雜感 -1-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8(8)/1988-09	330-342
雲岡石窟雜感 -2-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9(4)/1989-05	151-161
雲岡石窟雜感 -3-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59(8)/1989-09	343-356
雲岡石窟雜感 -4-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0(7)/1990-08	297-304
雲岡石窟雜感 -5-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0(9)/1990-11	370-376 397
雲岡石窟雜感 -6-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1(7)/1991-08	304-311 320
雲岡石窟雜感 -7-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1(8)/1991-09	345-350
雲岡石窟雜感 -8-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2(6)/1992-07	258-267
雲岡石窟雜感 -9-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3(5)/1993-06	205-209
雲岡石窟雜感 -10-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3(7)/1993-08	284-288
雲岡石窟雜感 -11-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4(6)/1994-07	222、242-247
雲岡石窟雜感 -12-	大山 みどり	史迹と美術	史迹美術同攷会	64(8)/1994-09	321-327